

革命史資料



19

革命史資料

19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革命史资料》编辑部编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一九九二·北京

责任编辑：郭丽卿

革命史资料19

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革命史组编

*

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通县燕山印刷厂印刷

北窑上装订厂装订

*

1992年4月第一版·1992年4月第一次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1/32 印张：7.75 字数：170千字

印数：1—1200册

ISBN 7—5034—0561—9/K·364

定价：3.95元

目 录

- 谢 宁 周总理参加志愿军后勤会议二三事 ……(1)
- 李 庚 抗战时期有关救国会重建的一些情况 …(4)
- 钟 辉 抗战初期的高树勋将军 ……………(13)
- 杨 凡 在吴奇伟将军处工作的经过 ……………(31)
- 程 文 回忆吴玉章同志 ……………(53)
- 王 翹 有关中共“六大”的实况 ……………(72)
- 方未艾 海参崴中国党校纪事 ……………(80)
- 李一凡 回忆中国共产主义劳动大学 ……………(86)
- 钟延璜 回忆中华苏维埃中央消费合作社 ……(103)
- 王中仁 中央苏区的反经济封锁斗争 ……………(119)
- 苏继光 招远黄金到延安 ……………(134)
- 陈继唐 董必武、董觉生对早期黄安革命运动
的开拓 ……………(141)

纪锦章	北伐宣传列车	(167)
李新俊	广州起义的一段回忆	(170)
饶 兴	红军时期的任弼时同志	(176)
杨光华	红军杰出将领段德昌	(183)
裴周玉	争取贵州“神兵”	(197)
吴邦彦	关于云南和平解放运动的主要情况	(205)
吴邦宪	先兄吴邦彦事略	(209)
曾长秋	张孝林 朱克靖传略	(211)
甄 言	抗战初期国共两党沟通关系经过	(227)

周总理参加志愿军后勤会议二三事

谢 宁

1951年1月下旬，朝鲜战场上第四次战役刚结束，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沈阳召开了第一次后勤工作会议。会议已在东北旅社六楼开了两三天，负责会议秘书处工作的楼适夷告诉我们：明天的会议改在专家招待所（现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开，你们准备记录，另从东北局请两名速记同志。当时，我想东北旅社的条件很好，会场为什么要临时转移呢？大概北京还要来高级首长吧，心里很高兴，但又不敢乱问乱猜。

第二天（记得是1月28日），我们很早就到了会场。这里比较肃静，一个中型会议室，面向讲台摆放十多排条桌，洁白的桌布和高背沙发椅上的蓝色天鹅绒配衬起来，十分雅致大方，室内显得宽敞明亮。与会同志相继入场，坐到各自的席位上，安静地但都流露着兴奋、盼望的心情，等待着开会。会场里充满了庄严的气氛。

上午8时许，从会场后面开始人们梯次站立起来。我从会场左前角记录席上向门开处望去，只见一位中上等身材，着藏青色中山装的首长，步履矫健地走到会场前端，掉转身来，向到会同志招手示意，原来是周恩来总理！昨天晚上虽然猜测北京可能来高级首长，但却没有想到日理万机的总理能亲自来参加后勤工作会议。与总理同来的聂荣臻代总参谋长等都在前排就座。

周总理在讲台右侧大约两三米远处一张单人沙发上坐下，随即一位工作人员在总理面前的茶几上放了一支铅笔和一些卡片纸。

这天上午是志愿军几个部队的后勤部长汇报朝鲜战场上的后勤供应保障情况。总理听得非常认真，特别是对运输线上的困难询问得很具体，不时地记下一些数字和情况。在听汇报的过程中，总理还随时决定了一些问题。有这么几件事，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当九兵团后勤部长关忠礼汇报到战士们反映戴大沿帽很不方便，钻树林容易被树枝挂掉时，周总理当即问总后勤部杨立三部长，还存有多少顶大沿帽。杨立三部长回答后，总理以征询意见又带有倾向性的口吻提出：“还是改为解放帽好不好？”杨立三部长回答说：“好！”1951年发夏装时，果然就改为解放帽了。战士的上衣式样也是这样定的。当关忠礼部长汇报中讲到战士“挂彩”（负伤）后，苏式套头上衣没法脱，剪开后又没法系扣时，总理又征询杨立三部长的意见，马上决定改为敞口系扣上衣。还有，因敌机袭扰，在朝鲜战场上汽车夜间行驶不能开灯，严重影响运输效率，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总理亲自决定派一个师的部队沿交通线设立夜间防空哨。实践证明，这是加强钢铁运输线建设的一个极其有效的措施。

会议中间休息的时候，总理主动和汇报情况的几位同志进行了亲切交谈。有的谈上三两句话就想起了对方的名字和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见过，以及其他一些细节。在继续开会前，总理还来到记录桌前，问我和另一位记录的同志是汉字记录还是速记？我们回答说是汉字记录，总理微笑说：“那太慢了！”然后又到从东北局办公厅请来的两位女同志面前，询问她们是什么记录。她们回

答说是速记，总理进而问是亚伟速记还是汪怡速记？两位女同志回答后，总理接着问哪一种快？我当时不懂速记，后来问那两位速记同志才知道，亚伟和汪怡都是速记创始人的名字，当时全国只有这两种速记。总理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的风度，惊人的记忆力和对诸如速记之类这些专门知识知道这么多，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抗战时期有关救国会重建的一些情况

李 庚

抗战时期的救国会原是一个具有广泛群众性的统一阵线的救亡团体。当时全国救国联合会的会员团体有文化界、职业界、妇女界、学生界各全国性救国会和上海、平、津、南京、西安、四川、华北、西北等各地区的各界救国联合会，会员众多，声势浩大，对组织民众，掀起全国的抗日救亡高潮，迫使国民党停止内战，促成抗战，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当时国民党独裁专制，不仅毫无民主可言，且对群众爱国行动横加镇压，因此当时在国民党完全控制的南方，参加救国会的主要成份，特别是其骨干分子，必然首先是政治觉悟较高，对抗日救亡有坚强信念而又愿为其实现牺牲奋斗的人。那就是当时称为“进步分子”或“前进分子”的人。1937年4月15日，当时为中共北平学委的黄华同志，在给南京秘密学联题为《我们对南方救国团体的意见》的信中指出：“南方的各界救国会、学联等团体，名义上是一般统一阵线，实际只是前进分子加入——只是一个左派团体或左派联合团体而已。”“实际上是左派集团。”应该说这一判断是准确的，是从少奇同志在北方局针对当时救亡运动情况提出反对关门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思想来的。

由此，信中又明确提出：“南方的救国团体应不要用一般的统

一阵线的名称。而应以左派团体为骨干，去建立、组织、巩固真正的一般统一阵线团体。”“一般团体与左派团体是相辅而行的。以左派团体去代替一般团体，必走上关门主义之路；而只要统一阵线，不要左派团体，是右倾机会主义。”“组织一般团体并逐步提高其政治意味，便是左派团体（像南京秘密学联这样）的任务。”

这里，既反对了把一般救亡团体变成左派团体的关门主义、宗派主义，又肯定了左派团体的存在及其应有的作用。

全国救国联合会的领导接受了这一意见，在1937年3月20日发了题为《救国会工作过去所犯过的错误》的《告上海各界救国会会友书》。表示过去救国会在认识上“不够了解中国问题必须经过真正的和完全的民族、民主运动始得解决……看不起一般的爱国主义，以为爱国主义运动只有前进份子可以包办……关起门来，组织方面完全是小组分区的一套，好像四万万国民都须编成小组交给组织部领导，每周开会讨论时事、做检讨、布置工作，学习材料都是左翼的社会科学书刊……越显得像一个政党……”

胡愈之先生在一份材料中也曾写到：“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召开，成立了全国性的救国会组织，但参加这次大会的代表，有一些是中共地下党员，还有一些是国民党反蒋实力派的代表（如两广、19路军和冯玉祥的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真正中间派的代表很少。所以会议的宣言、口号都比较“左”，对蒋介石国民党不能起争取、团结的作用。遂由在香港的胡愈之、潘汉年找邹韬奋、陶行知，根据《八一宣言》，以中间派的立场写出一个文件，主张国民党要停止内战，共产党要废除苏维埃和工农红军，要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等等。这个文件经韬奋、陶行知签名后，由韬奋带往上海，沈钧儒同意，章乃器却

不同意，嫌文件太右，坚决主张修改。甚至连题目也改为《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虽还保留了和《八一宣言》相同的一些论点，但失去了中间派要求的特色，因此对群众影响不大。”

以上材料说明了那时救国会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组织状况。当时指出救国会实际是个左派团体，而要求其在工作上来一个大转变，以适应发展扩大统一阵线的需要，是完全正确的。

但事过境迁，今天再来考察这段历史，却要承认：自“一二·九”运动兴起的抗日救亡运动，以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在广大群众中必然要出现一部分先进分子的结合、聚集，以至形成一种骨干力量，是个客观事实。北方，在少奇同志直接领导下，及时认识到了这一趋势并正确地给予解决。这就是在北平一方面坚持了北平学联作为北平全体学生的组织，一方面又发展了作为左派学生组织的民族解放先锋队。而在南方，左派力量就一直形成和存在于救国会这本应是广泛的统一阵线的团体之中。

应当承认，由于当时的实际条件，在救亡运动中，在抗战以前，已经逐渐出现和形成了一个中国的左派（非共产党的）政治力量。这是中国政治生活中，在国共之间、在各民主党派之间，有了一个“救国会派”的历史渊源。

救国联合会作为一个救亡团体，可以因形势的变化而成立或结束，但“救国会派”，作为一个已经聚集、组织起来的政治力量，是不会轻易消失的。而且应该认识到：这是使中国抗日民主阵营、进步力量得到扩大加强的一件好事。

这一点，蒋介石是意识到的，所以七君子出狱之时，就在庐山接见他们说：“现在已经抗战了，你们的目的是达到了，救国会就不要再搞了，你们今后可以在政府领导之下参加动员民众抗战

的工作。”当时七君子认为抗战确实已经开始，并且国共已经合作，今后可能开放民众运动，就没有提出要保留救国会的组织和活动，没有反对蒋介石的意见，等于默认。沈老自庐山到南京与南京救国会见面的时候，曾告诉我，周恩来同志批评了他们，说这等于接受了蒋介石取消救国会的意见，是错误的。救国会在群众当中有很大的影响，抗战了更需要它做很多的工作，应该是保留并且发展，不能相信蒋介石会真正开放民众运动。沈老表示完全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批评，这就使救国会的原领导核心当中有了恢复救国会的愿望。照沈老说，我们又没有和蒋介石定什么协议，我们还可以干我们的，可以继续联络各地的救国会朋友，重新继续工作。以沈老为代表，救国会的核心领导人就开始有两个意图，并付之实施。一个是要把救国会的骨干力量重新组织起来；一个是抓住时机，再组织一个公开的、大规模的统一战线的群众救亡团体。这两项工作从武汉到重庆，救国会都在不断地进行。

因为原来救国会总的领导机构没有了，所以1937年12月，沈老等人集中到武汉以后，就开始定期召集由救国会同志参与的各界群众代表开联席会议，并曾设有名为执行部或核心组的领导组织。王健同志保存的一份记录，就是当时这一联席会议的记载。从记载可以看出，当时救国会领导对恢复救国会抱着极为积极的态度，这一计划表示当时要把所有分散在各地的救国会骨干团结组织起来，如：湖南、广东、广西等地，并且还要向没有得力的救国会同志所在的地区发展，如云南、贵州。武汉失手以后，这一个团结救国会核心力量的工作还在继续，在重庆又建立过20人（记不清数字，沈谱处有材料）的核心组和五人的常委会（以上海、南京、华北、和四川当地的救国会同志为主），继续

和各地联系，企图使救国会继续成为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但这个工作困难重重，救国会的核心内部意见也不完全一致（如章乃器认为，救国会的成员应参加国民党，以改造国民党。韬奋反对救国会变成政党。王造时则不闻不问，不参与这个活动，反而与国家主义派关系较密。张申府、刘清扬等同志也常常要争论以上海救国会还是以华北救国会的人员为主），因此进行工作的步调不能完全一致。

1937年8月初，蒋介石下庐山回南京，马上又约见沈钧儒先生，向他提出：“你们要求抗日的目的已经达到，救国会就不要再搞了，以后可以在政府领导之下参加动员民众抗战的工作。”接着即派陈立夫、邵力子、叶楚伦代表国民党与七君子正式谈判解散救国会问题。自8月4日起连续谈了三天，因意见不同，僵持不下。国民党一意孤行，当即明令宣布：现在由国民党来统一领导组织各界抗敌后援会，规定：“所有合法团体皆应加入本会一致行动，不得再有任何其他救国性质的团体和单位行动。”随即，“国民党就在上海搞起了一个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由国民党C.C派的骨干人物潘公展当了主席。并在报上发出通告，要求文化界人士前去参加。”“本来上海文化界爱国人士已经组织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文化界救国会实际也是救国联合会的核心组织，很明显，国民党要以文化界救亡协会来代替文化界救国会，从而控制文化界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们经过研究，认为为了团结抗战，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化界救国会成员还是要参加进去，在其内部争取合法的抗日救亡活动的权利。”同时，“为冲破国民党对抗日救亡运动的限制，我们又采取由救国会会员发动组织文化界各种专业团体的办法，以团体会员的名义加入文化界救亡协会和

各界抗敌后援会，同时又保持各团体的独立性，来发展救亡运动。于是相继成立了戏剧界、游艺界、漫画界、编辑人等各种救亡协会，左派人士在这些协会中都占据领导地位，各自自主地进行工作。同时，救国会又支持创办了《救亡日报》(夏衍主编)和《中华公论》(张志让主编)、《抵抗》(邹韬奋主编)两种刊物，并在文化界救亡协会下，组织了国际宣传委员会(胡愈之负责)……“这样，对内对外的宣传阵地都为我们所掌握，”使C.C.人员无法控制。

(以上引号内的话均引自胡愈之同志所写材料。)

事实是，在蒋介石明令禁止救国会活动并在上海成立文化界救亡协会之后，救国会虽不再以本会的名义进行活动，但它的队伍并未瓦解，而是仍在继续工作，实际起着它本来具有的救亡运动(统一阵线)骨干力量的作用。

沈衡老那时暂住南京，借居聚槐村五号千家驹同志的寓所。南京救国会的孙晓村同志出狱后也住在此地。这里一时就成为上海、南京及江南一带救国会同人接头、聚会、交换情况和布置工作的活动中心。这所房子还是救国会妇女组组织慰问伤兵和青年组接待东战场流亡青年及将其中有志者送往延安的联络站。由南京秘密学联和南京平津流亡同学会共同组成的“首都平津学生救亡宣传团”，也是此时得到救国会的援助，出发到安徽腹地工作的。

那时川军出川抗日，成立了以刘湘为司令长官包括江苏、浙江、江西、皖南各一部分的第七战区，救国会经王昆仑同志向刘湘做工作，争取到刘湘决定以南京救国会的同人为主，帮助他建立起第七战区的战地动员委员会(人员基本组成后，因南京沦陷，这一带成了武汉的前卫地带，蒋介石撤消了七战区，改派顾祝同率国民党嫡系部队组成第三战区。这一才开辟的工作只好作

罢。)

上海南京相继沦陷之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政治重心，华北、华东各地的救亡团体和救国会成员纷纷撤至武汉。以沈衡老为首，在这里又继续进行救国会的工作，首先着手的是把原各地各界的救国会负责同志联系、组织起来。1937年12月开始了定期的救国会各界代表联席会，参加的代表有沈钧儒、沙千里、陶行知、钱俊瑞、张申府、刘清扬、史良、韩幽桐等人。当时这个联席会议还没有执行部，分设联络、秘书等组来负责日常工作，这方面的负责人有王昆仑、何伟、薛葆宁、陈传纲、李庚等。当时开始重新建立了联系的因战局变化分散各地的救国会骨干有湖南的杨东莪、曹伯韩、罗琼、廖庶谦、汪楚宝、刘良模，江西的孙晓村、王造时，浙江的骆耕漠、张锡昌、孙克定、张若达、张植华、吴大琨，河南的陈洪进、李紫翔，广西的千家驹，贵阳的张定夫、广东的史辟澜，重庆的漆鲁鱼、刘志刚，成都的韩天万、周曼如，香港的王新元等地诸人，并正在寻求发展联系在西北、西南的救国会同志的关系和工作。所有这些事实，归结起来就是胡愈之同志在他留下的《自传》材料所记的：“救国会的领袖沈钧儒、邹韬奋等这时都在武汉，他们在一起开会、讨论，开始恢复救国会的活动。”

除努力恢复本身的组织工作外，救国会还在武汉于1937年12月创办了《全民周刊》(出过30期)，由曹孟君同志负责发动建立了“战时儿童保育会”和设置战时儿童保育院(至1939年在全国建成十七所)，*支持章乃器和狄超白在第五战区的工作(章任安徽省财政厅长，狄在五战区战地动员委员会)动员了一些救国会成员和流亡的抗日青年前往大别山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根据地的开

辟。同时也动员另一些同志去山西临汾，支持李公朴先生在民族大学的工作。再一个重要事情，就是1938年国民党在军委会下成立了政治部，周恩来任副部长，郭沫若任第三厅厅长，胡愈之同志任三厅五处处长（主管宣传动员工作）。“第三厅集中了全国文化界的许多知名人士，五处则是以救国会人员组成的。”（见胡愈之文第3～26页）

救国会在武汉进行了恢复救国会的活动并做了许多工作。但并没有正式再建立救国会的组织。其原因一方面是避免国民党的干涉，另一方面胡愈之同志也有记载，即他在同一件文稿的3～27页一段所记：救国会领袖开始恢复救国会的活动，“但救国会原来只是一个松散的人民团体，在新形势下这样的团体是否需要存在？或是组成政党形式？我把这个问题向王明、博古（当时王明是中共长江局书记，博古为副。周恩来只是委员之一）谈了多次，都不得要领。实际上王明是不敢冲破国民党的禁令，怕救国会变成政党，会引起国民党的不满。”愈之同志说出了问题的要害。但王明、博古同志在救国会恢复问题上表现出来的思想不仅是个“怕国民党不满就不敢做的”右倾投降主义问题。以后在这个问题上还可以看到，他还有“左”的观点，对中间力量怀有戒心，不懂得如何去组织和发展代表中国中间阶层的民主政治力量，以扩大和巩固中国的抗日民族（民主）统一阵线，这和周恩来同志的看法、做法是很不一致的。

不必讳言，救亡运动自发生之日起，就有共产党的领导，救国会的领袖和骨干是倾向共产党、接受共产党领导的，还有相当一些救国会成员同时也是共产党员。王明的长江局第一把手对恢复救国会不予支持，再加上国民党对救国会的严密注意，救国

会在武汉和此后也就一直以并无正式组织的方式在进行实际上是有组织的活动。

救国会自身的组织虽然在以一种特殊的方式重建联系，开展工作，但暂时也只能止于此矣，因此与此同时，救国会也就将相当一部分力量，去发动、推动成立一个在新形势下团结面更为广泛的全国性救亡团体，这就是1937年11月即开始筹组的全国抗敌救亡总会。

1937年11月，为筹组全国抗敌救亡总会召集了第一次座谈会，到会的有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的沈钧儒、黄松龄、阎宝航、刘澜波、高崇民、潘梓年、章伯钧、张申府、沙千里、李璜、左舜生、李公朴、曹孟君、罗隆基、张西曼、王昆仑、梅龚彬、孔庚等27人，议定了以：“贯彻抗战到底，实现全民抗战，确定抗战政策，革新政治机构……”为宗旨，推出范长江、徐寿轩、王造时、潘梓年、李璜、罗隆基、王昆仑、梅龚彬等为“宣言”和“章程”的起草人，设立了由钱俊瑞、王炳南任正副主任的组织委员会和以何伟为首有袁青伟、汪德彰、祁式潜、李庚、季洪等参加的秘书组。但12月13日的成立会因故未能开成，随着向国民政府军委第六部（民运部，部长陈立夫）和国民党武汉市党部申请立案又阻力重重。不得已就先建立了一个在武汉的“救亡团体联合办事处”，国民党武汉卫戍区司令部表面上不直接加以干涉，实际上却当即下令限各团体在三日内离开汉口，“否则即予整肃”。

这时国民党已决心立即遏制各地迅速发展日益壮大的人民抗日民主运动。1938年2月底，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最先动手，以“未经合法筹备”为名，下令解散了西安文化界协会、西北青年救国会、西安中等学校教职员联合会等13个所谓“非法团体”。随后国